

# 美国开始“山寨”中国？不是笑话

本报评论员  
高路



当互联网本身就是一块肥沃的土壤时,开出绚丽的花只是时间问题。



“美国开始山寨中国”,纽约时报的报道让中国人受宠若惊,大意是说中国人原来山寨硅谷,硅谷有什么,中国山寨什么,现在似乎开始反着来,一些西方甚至是跨国巨头,都已经转而向中国企业寻求创新创意。

报道举了几个例,比如微信比脸谱更早想到向用户推送新闻,其模式也为多国互联网公司借鉴;在Venmo成为美国00后转账应用软件之前,中国无论男女老少都在用智能手机投资、还款、购物。在中国,手机应用付账、订购物品、看视频、相亲,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普及得多。

很多人不以为然,认为纽约时报的报道是不是在给我们戴高帽子,是在搞另一个版本的中国威胁论?要说中国的互联网技术应用已经超过美国,这恐怕不客观,国内的互联网巨头,其创意源头依然大多来自于美国,现在有一些领域走在了美国前面,也不代表中国互联网技术就掌握了话语权。互联网本身就是个开放的空间,一国垄断创新的可能性越来越

小,相互借鉴是很正常的事。我们有必要在这顶高帽子面前保持冷静。

中国互联网如今的成就一部分得归功于技术的发展。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高速发展,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发达经济体的行列。技术进步当然也不例外,华为就是一个典型。

但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为互联网经济做好的准备。马云有句话,一个了不起的企业,一定是为解决社会问题的。十多年前的中国,征信体系单薄、配套物流稀缺,淘宝网创办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交易稀少,因为没人相信陌生人。诚信问题在发达国家并不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,但是在中国,特别是在电子商务领域,就是道难关,于是一整套评价淘汰机制应运而生,这套机制确保了在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。现在关于网络购物的陷阱投诉仍然存在,但恐怕很少有人把这个当成严重的社会问题。你基本不用担心会买到图文不符的东西,也不用过于担心快递会把你的东西搞丢了,你要是给谁一个差评,他比你还着急。

它给了中国人珍惜自己的信用、尊重市

场规则的一个机会,也因为有了这个机会,互联网有了更大的前景。正是因为没有可依赖的东西,必须严格按照互联网、移动通信的规律去办事。所以,中国的互联网公司都扎根于中国社会,扎根于人性,扎根于互联网本身,也就具备了顽强的生命力。

这样的基础,也为各种创新扫清了障碍。滴滴出行只需要在性价比上上下功夫,无须为支付和信用问题担忧,因为前人的路已经铺好了;只要有好东西,互联网上的各种平台可以很方便地推广到众人面前。现在我们可以很方便地在手机上投资理财转账支付,这在传统银行时代是不可想象的,这种先进性让金融业发达的西方社会惊叹并不让人意外。

互联网也冲击着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,甚至治理模式。从政府到社会到个人,大家都在努力寻找互联网下的定位。当互联网本身就是一块肥沃的土壤时,开出绚丽的花只是时间问题。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个承认网约车合法化的国家,正是这种深刻变革的体现。

## 老拿高考状元说事,真不是个事

本报评论员  
李晓鹏



高考状元选不选,跟专业发展完全没有一点关系,大人们又何必如此纠结呢?



近日,澎湃新闻搞了个全国22个省(区、市)的应届36位高考状元的问卷调查,在志愿填报一项,高达61.11%的状元最喜欢经济类科系,33.33%倾向管理类科系,8.33%选择哲学,各有2.78%选历史学和教育学,而农学、医学、军事学类均无人问津。

针对无人问津的三项专业,已经看到有两份解读,一篇是“悲哀!高考状元竟然无人学医”,另一篇则是“高考状元为何不学军事学”,作者觉得“一阵悲凉”。估计,第三篇“高考状元为何不学农业”已在路上,作者可能还是“一阵悲凉”。在我看来,这是对高考状元这一名号的过度解读。

现在的高考状元含金量其实是大大缩水的。这些年,随着高考改革的推进,高中毕业生有了名校推荐、自主招生、提前录取等多重机会,一部分极为优秀的尖子生被提前掐掉,现有的高考状元,已经不能代表高中毕业生的最高水平。高考状元的出现,偶然性很大。比如考试的时候状态好,考试的

题目恰好被押中了等等。所以状元根本不能作为一个指标,来衡量这届高中毕业生有没有悬壶济世的理想,或者有没有精忠爱国的情怀。从人才发展规律来看,取得行业领先成就的,往往在中学时期不是最顶尖的学生,而是中等偏上的孩子,这就是所谓的“第十名现象”。高考状元的选择,真的没必要这么关注。

高考状元倾向于经济、管理类专业,不仅仅是中国特色,更是世界潮流。这并不能说明少人问津的专业,就没有发展的空间。恰好相反,我们在经济、管理领域并没有出现德鲁克等顶级的大师,也未能取得多少世界顶级的研究成果。反而是那些所谓“无人问津”的领域,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,出现了一大批顶尖的专家,搞杂交水稻的袁隆平、搞量子通讯的潘建伟、搞氢弹结构的于敏以及歼20、太行发动机、中国神盾舰等成就,在全世界都享有盛誉。这说明,高考状元选不选,跟专业发展没有一点关系,大人们又何必如此

纠结呢?

高考学子填不好专业,真正需要反思的不是家长和孩子,而是学校和专业本身。近年来,北大清华为了争夺高考状元,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。虽然这样做,只是给这两所名校锦上添花,争个虚名而已,不值得鼓励。但两所学校面对招生市场的主动性,是其他学校和专业应该学习的。

中国高等教育普及率依然较低,而我们的专业设置又过多过细,中国家长几乎没有多少专业背景,在选专业这件事上,很难帮到自己的孩子。而一个高中毕业生,要从几百上千个专业面前,找到适合自己人生发展的选择,是一件困难的事情,所以只能选择那些耳熟能详的经济和管理类。这至少说明,那些“少人问津”的学校和专业,没有在高中生中更好更有效地开展专业教育和市场推广工作,不能让他们更好地了解这些学校和专业。如果这一点能够做得更好的话,相信调查结果会是另外的模样。

## 这样护犊的父母心不值得同情

本报资深评论员  
刘雪松



他所寻求的理解与同情,谁想给可以给,法律不会给。



同时报了陕西师范大学志愿的两名“关系不错”的同学,其中一名自知分数上考不过对方,于是私下里记住了同学填报志愿时的密码,并且把对方可以两次修改志愿的机会全部用光,结果自己录取了,对方名落孙山。

东窗事发之后,利用同学不遮掩密码的信任而做尽手脚的郭某,被警方采取了强制措施。此前为了保全儿子、并且能够既成事实,郭父向对方提出赔偿10万元、动用关系让被挤掉了的考生常升去部队当兵,并且让常升一家写一份不追究郭某责任的“谅解书”。

郭父以为,对于常升这个贫困的家庭来说,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。然而事实并没有沿着郭父用钱铺设的道路发展,常家拒绝了。面对儿子前途断崖,郭父一改与常家用钱“交易”时的傲慢腔调,面对媒体作掩面大哭状,称自己平时忙生意,没把儿子教育好,“儿子现在后悔不已,想自杀的心都有了”。

郭父这一招还真灵,网上同情心泛滥起来了,有网友纷纷提出各种“治病救人、保全两家”的方案,希望陕西师范大学发发善心,把郭某和常升一并录取。

18岁的成年人了,郭某心计好使到这个程度,并且把同学的志愿修改机会全部用光,断然是想让对方的人生轨迹变道,为自己的人生铺路的。东窗事发之后,儿子已经给了郭父好好“教育”他的机会了,但是郭父“教育”儿子的办法不是带着孩子去受害的同学家去“谢罪”,也不是让儿子去公安机关自首,而是展开了“资本运作”,这给儿子上了一堂郭家处理法治的现实课。然而这次,天真的“塌”下来了。

罪有应得是法治社会的常态。天下父母心,在郭父当初拿钱来换的时候,是一点都不可怜的。那种有钱支付的施舍心态,那副不写“不追究责任的谅解书”就不好商量的姿态,郭家父母的“可怜”,是建立在对别人的父

母不可怜的狠心之上的。所以,这番父母心,没有可怜,只有可恨。

网友的同情心,是以被篡改了志愿的常升能够如期被“拨乱反正”为前提的,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“得饶人处且饶人”的处事原则。意思是,既然你没少什么,不妨也成全别人,这样两个人都有敞亮的路可以走。这跟复旦投毒案发生之后,网友中同情心泛滥者所持的“逝者已逝,不如让生者活着”一样,都是对法治原则、人与人之间生存规则的无视。这种情绪,表面上是言善,实际上是纵恶。

作为成年人的郭某,为自己涉嫌犯罪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,这是天经地义。他的未来,有的是重新做人的机会。但是,将来为人师表的陕西师范大学课堂上,他的座位不应该有。作为孩子的父亲,郭父的爱子之心谁都无权剥夺,但是,他所寻求的理解与同情,谁想给可以给,法律不会给。